

“反对形而上学”是假 否定教育革命是真

武汉大学大批判组

前一时期，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玩弄了种种骗人手法，其中之一就是打着“反对形而上学”的旗号，攻击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是“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他们真是反对形而上学吗？完全是假的，他们那些奇谈怪论就是极力鼓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标本。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否定教育革命。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全面地深刻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争取在文化上彻底翻身解放的迫切要求。按照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可是，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攻击我们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只讲培养工人、农民的“一面”，不讲培养干部、技术员的“一面”，有“片面性”。

关于学校应当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要求。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学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下，把广大工农兵排斥在大门之外，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高贵者、修苗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条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学校向工农兵开门，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毕业后又回到工农兵中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培养无产阶级的千百万是“片面”，而对旧学校培养少数高贵者这个目标不置一辞，这只能说明他们顽固坚持剥削阶级的偏见。

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首先应当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不能而且还不愿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能够做好无产阶级的干部和技术员吗？把自己看作比普通劳动者高一等，这就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这正是今天要加以批判的东西。而奇谈怪论者却把做工人、农民和做干部、技术员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培养工人、农民就不能培养干部、技术员，因而是“不全面”。显然，他们所谓的“全面”，就是要用“干部、技术员”这一面，否定“工人、农民”那一面，就是要培养脱离群众、傲视工

农、高居于工农之上的精神贵族。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党的教育方针规定的培养目标，是党的基本路线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在阶级社会里，学校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各个阶级总是要为自己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我们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它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战士，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作出贡献。这是对一切旧教育制度的深刻革命。它划清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根本界限，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可是，奇谈怪论者却借口不同学校有不同特点，攻击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又回到工农中去有“片面性”，这岂不是说党的教育方针只适用于一些学校，而不适用于另一些学校吗？这同刘少奇竭力推行过的资产阶级的“两种教育制度”，同林彪鼓吹的学校要培养“五分”“尖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可见，他们攻击我们“片面”，不过是借口特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否定党的教育方针，改变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校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就是专门培养干部和技术员的，没有一个毕业生去当工人、农民。这就是那些奇谈怪论者攻击我们教育革命中所缺少的“那一面”。但是，那时的情形怎样呢？有些工农子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却被以种种借口赶出了学校大门；有的人则由于封、资、修思想的毒害，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而瞧不起工人、农民。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从一九七〇年秋开始，先后招收了六届近五千名工农兵学员。他们不忘阶级的委托，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毕业分配时，他们纷纷要求当工人、农民，决心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现已毕业的二千余名工农兵学员，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不少人既是工人、农民，又是干部、技术员，热心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受到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群众称赞他们是“劳动人民的大学生，上了大学的劳动者”。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片面”，这不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什么呢？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一个根本问题。我们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正是抓住了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奇谈怪论者撇开这个本质方面，侈谈什么要“全面”，无非是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永远保持体力

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由少数人垄断科学文化，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由此可见，我们同奇谈怪论者之争，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必须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坚持开门办学。而奇谈怪论者却攻击我们“只开门，不办学”，“不讲学文化”，是“不全面”。这是对开门办学的恶意歪曲！

毛主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青年应该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开门办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转变学生的思想，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生，如果不懂得阶级斗争，分不清路线是非，怎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呢？只有通过开门办学，让学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才能不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如果只讲“学文化”，不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丢掉阶级斗争这门主课，那就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奇谈怪论者口口声声强调“学文化”，却只字不提思想革命化，完全是为了搞“智育第一”、即资产阶级政治第一，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全面”。

我们坚持开门办学，把社会大课堂和学校小课堂结合起来，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广大学生走出狭隘的学校圈子，投入火热的群众斗争，可以大大激发为革命而学习的热情，认真钻研业务，做到政治与业务的统一，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生直接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可以学得生动、活泼，掌握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不断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试问：学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知识不叫学文化，难道象旧学校那样学习“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才算是学文化吗？我们在开门办学中，既上好了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又学到了真正的科学文化知识，这能说“不全面”吗？

事实是对奇谈怪论有力的驳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校广大师生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工厂、农村开门办学，把教育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加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结合评论《水浒》，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师生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加速了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进程。几年来，理科师生实行厂（社）校挂钩，结合典型产品和典型任务组织教学，与工农技术人员一起开展科学研究，先后完成了二百多项科研和技术革新课题，其中一百六十九项科研成果已在有关部门应用推广，有的填补了国内某个科技部门的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奇谈怪论者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完

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主观臆造。

列宁说：“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那时，师生被禁锢在高楼深院，读死书，死读书，向故纸堆里讨生活，从文献夹缝里找课题，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向古人、死人、洋人顶礼膜拜，搞“纯学术”、“纯理论”式的“研究”，不少人由于受封、资、修思想的毒害，变成了书呆子、“病壳子”，有的甚至成了“修苗子”。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曾经尖锐地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而奇谈怪论者却念念不忘恢复摧残青年的旧学校。可见他们攻击开门办学“不全面”，就是妄图恢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校的统治，继续让资产阶级在学校这块阵地上专无产阶级的政。

列宁曾经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正是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来欺骗群众的。在培养目标上，他们既讲了培养干部、技术员“一面”，又讲了培养工人、农民“一面”，看起来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培养精神贵族，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在开门办学问题上，他们诬蔑我们“只开门，不办学”，好象他们既赞成“开门”，又赞成“办学”，也很“全面”，实际上是主张关门读书，搞“智育第一”，反对开门办学，取消无产阶级政治。他们就是这样处处以“全面”、“公允”的面目出现，左一个“全面”，右一个“全面”，“一方面”，“另一方面”，攻击我们这也“片面”，那也“片面”，似乎别个无不偏激，唯独他们自己最“正确”。事实上，他们是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第二，主要次要，统帅被统帅，用形而上学的均衡论代替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他们妄图以此掩盖事物的本质，混淆路线是非，全面篡改党的教育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

玩弄折中主义的手法反对教育革命，并不是奇谈怪论制造者的新发明，而是刘少奇之流对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的故伎重演。一九五八年，广大革命师生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光辉照耀下，掀起了一场教育革命，许多革命的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可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着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这场革命刚刚起来就被他们破坏了。他们打着“纠偏”的旗号，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要培养什么“高、精、尖”人材，攻击许多革命师生走出课堂、下乡下厂是“打乱了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等等。他们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旗帜，把支流当主流，把革命的东西说成是形而上学的东西，一下子把教育战线上的许多新生事物砍掉了，把修正主义的一套货色又重新搬了出来，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

（下转 41 页）

的直接上大学”，这分明是要把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人工农兵赶出学校大门，把学校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温床；他们诽谤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是“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这分明是要把我们同工农兵、同三大革命斗争实践隔绝开来，走闭门修养的老路。他们叫嚷要让“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这分明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教授治校”等右派言论的老调重弹，是妄图把工人阶级赶出学校大门，夺走学校领导权，让资产阶级重新专无产阶级的政，其用心何其毒也！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这是一条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对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惶惶然不可终日，甚至连喝酒的杯子不象老祖宗的时候那样制出棱角，也要骂一句：“酒杯，酒杯，不象酒杯”。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象孔老二一样，也象当年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对于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看着不顺眼，想着不顺心，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总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老祖宗的好；要改变老祖宗的陈规旧矩，就是“今不如昔”，就是“糟得很”，就要拚死地加以反对和扼杀。但是，“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孔老二这条丧家犬没有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陈独秀之流也终于被革命群众运动的洪流冲刷掉，今天，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决不会有好下场！

（上接 38 页）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历史舞台，夺回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学校面貌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涌现出大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者又搬出刘少奇一伙曾经使用过的那一套卑劣手法，妄图扼杀这些新生事物，使学校重新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因此，一场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场大辩论，是教育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斗争的继续。斗争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里谁专谁的政的问题。在这场大辩论中，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及教育革命的论述，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力扶植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胜利。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二期）